

石峁遗址的发现与中华文明探源的进路 ——关于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的再思考*

杨 骊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四川大学 锦城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 2012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中,一个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市遗址——石峁遗址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以石峁遗址的发掘与石峁玉器研究为契机,2013年6月,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此次研讨会开启了考古学与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学术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就该会议的核心议题进行再思考,试图从石峁遗址的发现出发,结合对玉石之路、玉石文明的考察,在考古学和文学人类学相结合的视域勾勒出中华文明探源的一种进路。

关键词: 石峁遗址; 玉文化; 中华文明探源

Abstract: The largest prehistoric city relics, Shimao, acknowledged as one of the ten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2012, has caught worldwide attention up to the present. With the excavation of Shimao relics and recent studies on jade articles of Shimao, a conference on Chinese Jade Road and jade weapons culture was held in Yulin, Shanxi province in June, 2013. The conference, which started the cross-disciplinary dialogues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has peculiar significance in academic hist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think the kernel topics of the conference and examine a route of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 with the help of studies on Chinese Jade Road and jade culture in the vision of combination of archaeology 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Key words: Shimao Relics; jade cultur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rigin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4)03-0039-10

2012年公布的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中,一个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市遗址——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宏伟壮观的石砌城墙与数量众多的石峁玉器,显示了石峁遗址在史前文明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少专家惊呼,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这一石破天惊

* 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在实证与阐释之间: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11YJCZH209)阶段性成果。

的发现很可能改写中华文明史。以此为缘起,2013年6月,以“探寻中国梦的缘起,重现失落的远古文明”为宗旨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来自考古学界、收藏界、文学界、文学人类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会议宗旨,与会学者就“石峁古城的发掘与石峁玉器”、“玉石之路与沿线玉矿考察”、“玉兵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研究玉石之路的意义与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亮点。

此次研讨会以石峁古城的发掘与石峁玉器研究为契机,开启了考古学与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学术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将就该会议的核心议题进行评述和再思考,试图从石峁遗址的发现出发,结合对玉石之路、玉石文明的考察,在考古学和文学人类学相结合的视域勾勒出中华文明探源的一种进路。

一、石峁遗址与中华文明探源

研讨会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孙周勇先生介绍了石峁遗址的发掘情况。他指出,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2012年首次确认了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构成,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2012年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这表明石峁遗址系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①

宝墩古城(面积约276万平方米)、陶寺古城(面积约28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发现曾刷新了人们对史前文明的认识,而石峁古城后来居上,成为史前最大的城址,这对于中华文明探源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但是,面对一个4300年前的无文字文明,太多的谜题难以破解:石峁遗址如此庞大的建筑规模和面积,其归属却难以确定。石峁遗址处于北部塞外游牧文明和塞内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位于西北齐家文化和中原陶寺文化的中介点,它对于早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有何作用?截止笔者撰写此文,石峁遗址已经陆续发现了80多个或集中或分散的头骨(其

^① 引自孙周勇的会议发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问题报告在2013年8月上海举行的世界考古大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在该会议上石峁遗址入选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中年轻女性较多),被较为集中地掩埋在城门或城墙附近[1]。加之石峁遗址极其奢侈的建筑用玉,这其中包含了4300年前先民怎样的文化观念和信仰体系?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做出的解答相对受到学科的局限。长期以来,历史学界拘囿于中国这个文献大国的传统,尚未摸索出解读无文字文明的有效方法;而作为历史学附庸的中国考古学,则仅限于做历史学的材料提供者。从此次会议可以看出,考古学在缺乏民族志材料和历史文献的情况下,在推断由文化决定的信仰和行为方面较为薄弱;而文学研究又容易陷入难以实证的想象性假说。换句话说,在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课题研究中,实证性的考古学证据需要跨学科的文化阐释,尤其需要能够兼顾实证与阐释的方法论。

著名作家朱鸿先生根据洪水神话传说,推测石峁可能是尧世时代的幽都。他根据石峁居高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对照汉字“尧”中潜含的“高”之意义,提示重新审视陕北史前文化的新观点。^①朱鸿从文学出发,借助神话和民间传说做出的大胆推测,倒是正应了李济先生的话: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文学家,“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2:364]但假说毕竟不能代替实证,此前沈长云先生也曾在《光明日报》发文称石峁遗址为黄帝部落存在的证明[3]。但陈民镇先生却不赞成将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人物直接挂钩[4],指出假说容易,求证却难。笔者认为,要想说明石峁与尧文化的关系,至少还需要两个方面的求证:其一是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考察榆林和神木县当地民间与尧有关的信仰和传说;其二是用考古学证据充分论证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关联。因为陶寺遗址比邻尧庙,而且襄汾当地流行尧舜传说,被考古界部分学者认为属于尧文化范围。

在会上,从石峁遗址的文化解读到中华文明探源的进路,历史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界提出的观点引起了较大关注。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张光直先生的弟子、台湾中研院王明珂教授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文化及其人类生态意义》中,从文化认同的维度来分析华夏认同与资源竞争的关系。他认为以石峁为代表的玉石文化是人群走向阶序化、集中化的征兆。资源的缺乏导致人群之间冲突增加,防卫性建筑开始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了夏商等核心政权,而石峁和其它很多文明则消亡了。华夏文明认同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月渐明,星渐稀”的过程。^②检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① 引自朱鸿会议发言《中华文明探源视野中的石峁城玉之观察》,该文后以《石峁遗址的城与玉——中华文明探源视野中的文化思考》为题,发表于2013年8月14日《光明日报》。

② 引自王明珂会议发言《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文化及其人类生态意义》。

其一是古老却至今影响颇大的“中原核心说”, 其二是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 其后费孝通发展出关于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一体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上海交大和中国社科院叶舒宪教授从石峁玉器研究出发, 对“多元一体”之“体”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旨在从理论上和实证材料上说明, 原来文明的多元和多源, 是怎样变成一体的。他认为玉石神话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元素, 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就先从精神文化领域统一了中国。他列举了四类玉器(玉璋、玉璧、玉琮、玉人头像)的史前传播分布路线, 说明华夏史前先民在不同地域不约而同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 其现象背后是共同的玉石神话信仰[5]。有学者根据世界闪玉矿与辉玉矿的分布, 指出全球有东亚、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岛屿三大产玉带, 东亚的华人、中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 形成环太平洋著名的三大玉文化板块。而其中起源最古老、范围最广、延续最久远的东亚闪玉文化圈中, 中华民族恰是这一玉文化引擎的启动者[6:204]。玉石被称为“玉魂国魄”, 早在 2000 年初, 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倡议国家重视对玉文化的研究, 他认为:“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好的精神和优秀传统, 能贡献给未来的世界?……在纷繁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 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玉器。玉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种现象是西方所没有的, 或者说是很少见的。我们考古学界是否可以将对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 从更深刻的层面上阐述玉器在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意义, 把考古学的研究同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7]进入 21 世纪, 国内的文学人类学界继承费先生的宏愿, 大力推进中国玉文化研究, 本次会议就是明证。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大和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则从文学人类学文化表述的角度, 对中华文明探源的关键词进行了反思。他指出, 西学“文明”、“史前”这两个概念对于汉语世界的历史表述既有敞亮, 又有遮蔽。“史前”这一术语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 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二, 并以文字为中心, 凸显了“文明”的核心地位。^①套用西学概念进行中华文明探源, 的确会造成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遮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就曾反思过西方考古学的三时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他引用东汉袁康的《越绝书》中风胡子对古史的分期, 指出“把古史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将这四个阶段的进展变化与政治力量相结合。……很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经过的本质变化撮要出来了。”而西方考古学的三时期说中间缺了一个玉器时代, 其原因是玉在西方的重要性不如中国。“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

^① 引自徐新建会议发言《“史前”和“文明”的表述意义与局限》。

石器到铜器的转变 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 ,而这种转变在中国社会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 [8:81]虽然玉器时代之说在目前还争议颇大 ,但中国学界对此的研究 ,可能会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划分贡献出独特的中国经验。

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杨骊博士则从方法论角度进行论述 ,呼吁考古学与文学人类学的对话。她以文学人类学界近年来提倡的多重证据法为例 ,主张在中华文明探源中 ,不仅要继承当年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传世文献为第一重证据 ,地下文献为第二重证据) ,更要通过人类学的第三重证据和考古学的第四重证据之间的互证互释 ,实现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的融合。^① 其实 ,利用多重证据实现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的融合 ,在国外的文明探源研究中早已不乏成功个案。法国神话学家乔治·杜梅齐尔曾以比较神话学方法 ,从神话语言中寻找关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要素 ,从印欧神话研究中发现了印度历史上的三大种姓与古罗马的主神朱庇特、战神马尔斯、民众之神基林努斯之间的对应关系 ,进而推论出古印欧社会的“三功能”结构 ,从而通过比较神话学研究得出关于古代印欧文化的假说 [9]。如果说杜梅齐尔关于印欧文化的假设还停留在第三重证据的阶段 , John V. Day 所写的《印欧人的起源:人类学证据》则是多重证据相结合的知识考古典范。书从语言、词汇、音韵、文本、古代艺术品、皮纹、颅腔、基因等证据入手 ,尤其运用了第四重证据的实证功能 ,对印欧文化的起源进行了详实的论证 [10]。此外 ,以金芭塔丝为代表的神话考古学范式也与多重证据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活着的女神》 [11] 中 ,金芭塔丝主要立足于史前考古发掘的女性雕像及相关图像 ,结合人类学、民族学所提供的仪式性证据以及神话学证据 ,由此来研究古欧洲文化中的女神崇拜在欧洲民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功能。这一研究范式显然是对杜梅齐尔的比较神话学的一大推进 ,值得中国学界借鉴。

二、玉石文化研究与重估大传统

石峁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新的入口 ,也为“玉石之路”、玉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证据。早在石峁遗址发掘之前 ,流传在外的石峁玉器就非常出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指出 ,“上世纪 70 年代 ,就有考古人员在石峁征集到 127 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陕西省博

^① 引自杨骊会议发言《实证与阐释:考古学与文学人类学的对话》。

物馆收藏。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12]神木县石峁文化收藏研究会会长胡文高先生先后收藏有石峁玉器500余件,他在会议上介绍了自己15年来收集石峁玉器的经过,并指出石峁玉器具有如下特点:数量多、尺寸大;用料较杂,其中有和田玉、岫岩玉;器形较齐全,从礼器到生活用品都有;制作工艺精湛。^①由此可见,石峁玉器的数量、尺寸、器形和工艺表明其处于玉文化的成熟阶段,而其复杂的玉器用料似乎又暗示着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以石峁玉器为起点,与会学者展开了关于玉石之路的讨论。会议对玉石之路的研究从理论论证和实地考察两方面进行,对以往玉石之路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也留下大量有待推进的研究空缺。玉石之路的命题最早于1989年提出,杨伯达在《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13]一文中,根据丝绸之路和出土玉器勾勒出新疆和阗到安阳的玉石之路,其后又有臧振[14]、张如柏[15]、古方[16]等学者设想出多条“玉石之路”路线。然而,多条“玉石之路”的假想如何得以证实?21世纪初,有学者和研究团体从科技考古、地质考古等路径进行实证,^②然而因为科技测试方法的缺憾和相关玉石数据的积累不够,结果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从20世纪末中国学者提出“玉石之路”的命题以来,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以“玉石之路”为主题的研讨会,把玉石之路研究提升到一个文化战略高度,反映了中国人文学界日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意义正如会议发起人之一叶舒宪先生所言,殖民列强代表李希霍芬于1877年命名的“丝绸之路”,是在对玉石之路的存在完全不知情的知识空缺条件下,出于欧洲人视角的一厢情愿式命名。时至今日,如何穿透小传统的丝绸之路说的遮蔽,探究玉石之路大传统的真相,成为摆在后殖民时代中国本土学人面前的紧迫课题[17]。联系文学人类学学界近年来提出的重估大传统之说,^③对玉石之路的研究,

① 引自胡文高会议发言《石峁玉器的特征》。此文后易名为《我的收藏经历和石峁玉器》,发表于《收藏界》2013年8期。

② 关于玉石之路科技考古与地质考古的相关情况梳理,参见唐启翠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的《“玉石之路”研究综述》。这一系列科技和地质考古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200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记者联合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全方位的“玉石之路”科考。此次科考成果可参见梵人、何昊、玉志安编著:《玉石之路——遗失在古墓中的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和骆汉城等编著:《玉石之路探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二著及相关文章。

③ 自2010年始,文学人类学学界对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理论提出了反转性的重估,把文化传统分为大传统(前文字和无文字传统)、小传统(文字传统),提出要超越对以文字为标识的文化小传统研究,借助口传文化、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材料,来达到对从无文字时期延续下来的文化大传统研究。参见叶舒宪、郑杭生、徐新建、彭兆荣、徐杰舜《“原生态”引起的一场论战——传统是什么?》,《光明日报》2010年8月9日。

其实质就是超越李希霍芬根据文献知识所做出的丝绸之路的小传统知识命题,回归更为久远的玉石文化大传统研究[18],进而深入到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价值观研究。因为“玉石之路”不仅是玉石物资的传送通道,更是文化传播和信仰交流的见证,跟意识形态的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对玉石之路的论证中,叶舒宪认为石峁遗址的发现提示着“玉石之路黄河段”的存在,即玉石之路应包括陆路和水路两部分,而早期玉石是通过黄河水道来运载的,这与古人心目中的“河出昆仑”、“玉出昆仑”等神话地理观是相符的[5]。叶舒宪早前已经在《玉石之路黄河段刍议》、《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等文中指出过黄河水道与玉石之路的联系,可惜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石峁遗址的发掘,恰为玉石之路黄河水道的假说,提供了一个较有力的实证。^① 笔者梳理以往的玉石之路研究,多数是根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矿产资源以及民族迁徙路线等线索进行推断,却对玉石之路(“玉出昆冈”)与黄河水道(“河出昆仑”)的神话性重合视而不见。叶舒宪从文学人类学神话历史的研究角度切入,从神话叙事和神话思维中探寻和解读出重要的历史信息,不啻为玉石之路研究推开了一扇窗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在《从齐家到二里头:“玉石之路”佐证》中,赞同叶舒宪所倡导的“玉石之路”研究,并从青铜、小麦、羊、牛、卜骨、陶器六方面对“玉石之路”进行补充论证。^② 易华的补充论证呈现出文化交流演变的立体性,提示了玉石之路论证的多重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研究员在《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一文中,通过比较殷墟妇好墓、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以及新干大洋洲商墓的玉石仪仗,揭示了三者所含玉石仪仗用具显示出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③ 此文从另一个重要侧面证实了中原与周边玉文化的交互影响。

围绕着玉石之路的实证考察,与会学者就玉石之路的甘肃路段提供了田野考察和考古报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辉所长介绍了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发掘的新情况。马鬃山玉矿遗址发现古矿坑百余处,初步判断遗址的年代储备为战国至汉代,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代玉矿遗址。^④ 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古方先生通过对马衔山周边地区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界史前玉器的调查,认为其玉料存在着一致性,可以肯定该

① 参见叶舒宪:《玉石之路黄河段刍议》,《首届全国玉器收藏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2012年11月;《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丝绸之路》2012年第17期。

② 引自易华会议发言《从齐家到二里头:“玉石之路”佐证》。

③ 引自李健民会议发言《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④ 引自王辉会议发言《甘肃马鬃山古代玉矿新发现》。

地点的玉料是齐家文化玉器原料来源之一。^①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玉雷先生则以田野考察报告的形式,介绍了他和叶舒宪考察甘肃定西、静宁等地的经过,进而推测静宁可能是齐家时代西玉东输的重要集散地。^②笔者发现,除了考古界,收藏界、文学界、文学人类学界也加入了玉石之路的实地考察,并从各自的学术积累出发,为玉石之路的实证提供了新鲜的材料。然而,玉石之路贯穿中国东西南北,多条路线和大量节点有待学界进行踏勘和考察,玉石之路的实地调研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矿物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合作。对此,文学人类学所擅长的田野调查可以发挥用武之地,可以通过对相关的民间口传文学和民族文化走廊的研究为玉石之路的实证提供更多的人类学材料。

玉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源远流长,与会学者的研究则聚焦于以玉戈和玉钺为代表的玉兵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在《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中指出,在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的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兵器渗入并局部替代既有的玉礼器,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③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孙志新先生在《良渚文化的玉钺》中考察了玉钺的发展史。他认为钺最早应当源于普通的石质武器和砍砸工具,而到了青铜时代和帝国时代早期则为王权与军权的象征。^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在《论玉兵之戍》中,通过分析玉戍从工具到权杖的过程,对“戍与王”进行了文字学解析,认为钺通过玉化的途径完成了王权的符号化,以玉戍为代表的玉兵可以看作是早期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⑤此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琨璋先生、《中国考古学》曹楠副编审、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则分别用类型学和统计学的方式,梳理了玉戈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晚期到龙山晚期兴起,及至夏商周三代的兴盛到东周以降式微的演变轨迹。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助理王方女士介绍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出土的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器形多样的玉兵器。^⑥

然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玉石做成的兵器变成神圣的祭器,把

① 引自古方会议发言《甘肃临洮马街山玉矿调查》。

② 引自冯玉雷会议发言《寻访玉石之路》。

③ 引自许宏会议发言《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

④ 引自孙志新会议发言《良渚文化的玉钺》。

⑤ 引自王仁湘会议发言《论玉兵之戍》。

⑥ 参见吉琨璋会议发言《由兵入礼的华丽嬗变——先秦玉戈演变考察》、曹楠会议发言:《考古发现的三代时期玉质兵器综述》、刘云辉会议发言:《东周一汉代玉兵述评》、王方会议发言:《古蜀国出土玉兵器及其意义》。

“祀与戎”合二为一,这背后蕴含着怎样意味深长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符号内涵?叶舒宪通过对石峁建筑用玉以及多人头颅坑的现象,用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演绎论证了华夏先民使用玉兵器的文化心理。他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三重证据和考古学发掘类似情况的第四重证据证明:玉石兵器加上人牲用于建筑中,其实根植于先民的避邪观念,是一种建筑巫术的表现。玉兵器本身不是实战武器,而是神话想象的强大武器,即驱鬼避邪类神话信仰所催生的精神武器[5]。笔者注意到,叶舒宪此前在《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一文中,也曾用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求证天人合一神话的“大传统”,通过分析玉玦起源的神话学意义,来探讨整个东亚玉文化起源的神话观念基础[19]。

从叶舒宪近年来对玉文化的研究路径,可以看出在玉石文化研究领域,文学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的迥异之处是:文学人类学更侧重文化研究,他们借鉴了国外神话历史模式,从人类神话思维法则出发,去探究玉石信仰背后的文化大传统,试图重建一条贯穿史前与文明时代的文化通道。此次研讨会汇集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各路诸侯”,其中有不少学者专家都主持和参与过当代国内重大遗址的发掘,他们为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和证据。不过,目前考古界的多数研究还在遵循傅斯年当年在史语所提出的“证而不疏”的原则。对此,费孝通先生提出过中肯的意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根据胡适的思想,在我国的考古学界,提出考古学要实事求是,以资料为主,资料以外的事不要多讲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十分及时的。然而,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考古研究,应当更加注意文化的意义,因为文化的意义在当代,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问题。”[7]这也许意味着,在玉石文化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借助于科学实证的手段与方法,在史料的鉴别与考证上力求真确;另一方面,在对史实的阐释与逻辑的疏通上,则应具备人文艺术的视野与思路。从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原理来看,物质文化不仅研究物质客体本身,还要研究物质背后人的行为,更要研究人的认知问题。换句话说,物质文化是关于物质客体的文化表述(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in material objects)的研究[20]。从物质文化研究入手,研究无文字之“物”所承载的人类文化思维与认知,正是文学人类学界超越文字表述的文化小传统,重估文化大传统的研究策略之一。作为中华文化探源的重要一环,玉石文化可以说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物的民族志”,从考古学和文学人类学结合的视野深入解读这部民族志,也许会揭示出研究中华文明发生的特殊奥秘和核心价值的一条路径。

参考文献:

- [1] 赵建兰. 陕西石峁遗址新发现 80 多个头骨[N]. 中国文化报 2013-12-05(003).
- [2] 李济.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M]//安阳.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3] 沈长云. 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N]. 光明日报 2013-03-25(015).
- [4] 陈民镇. 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N]. 光明日报 2013-04-15(015).
- [5] 叶舒宪. 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J]. 民族艺术 2013, (4):11-28.
- [6] 黄翠梅 叶贵玉. 从玉石到玉器——环太平洋地区玉文化之起源与传布[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 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 编著. 玉文化论丛 4——红山文化专号. 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 2011.
- [7] 费孝通. 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J]. 群言 2001,(8):27-28.
- [8] 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二) [M]. 上海:三联书店,1990.
- [9] [法]迪迪耶·埃里邦. 神话与史诗:乔治·杜梅齐尔传[M]. 孟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Day, John V. *Indo-European Origins: The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M].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2001.
- [11][美]金芭塔丝. 活着的女神[M]. 叶舒宪 等,译.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8.
- [12] 陈方莹. 神木石峁遗址或改写中华文明史[N]. 西部时报 2013-01-22(003).
- [13] 杨伯达. 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1):32-48.
- [14] 臧振. 玉石之路初探[J]. 人文杂志,1994,(2):79-89.
- [15] 张如柏. 中国古代玉石之路初探[J]. 中国宝玉石,1995,(3):72-75.
- [16] 古方. 对玉石之路形成时间和路线的一些认识[EB/OL](2006-11-14) [2013-07-03] http://www.chinajades.cc/asp_club/read_zj_paper.asp?zj_name=&id=149.
- [17] 叶舒宪. 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的形成[N]. 光明日报 2013-07-25(011).
- [18] 叶舒宪. 怎样从大传统重解小传统——玉石之路、祖灵牌位和车马升天意象[J]. 思想战线 2013,(5):23.
- [19] 叶舒宪. 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四重证据求证天人合一神话“大传统”[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2):186-190.
- [20]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Object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